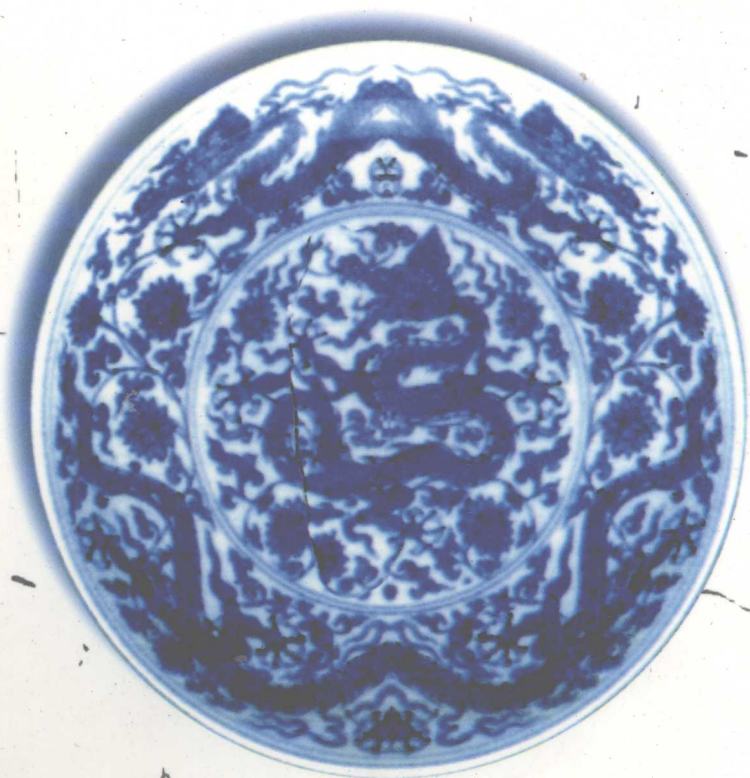


桐城派与
中国文章

理论

万奇 著

TONGCHENGPAI YU
ZHONGGUO WENZHANG LILUN



内蒙古教育出版社

万 奇 著

桐城派

与中国文章理论

YU ZHONGGUO WENZHANG LILUN

内蒙古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/万奇著。—呼和浩特: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, 1999.7

ISBN 7-5311-3817-4

I. 桐… II. 万… III. 桐城派—文学研究 IV. I207.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1999) 第 29258 号

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资助项目

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

著 者: 万 奇

责任编辑: 王牧远

装帧设计: 马 莲

出版发行: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

呼和浩特市新城区西护城河巷30号 邮编: 010010

印 刷: 内蒙古瑞德教育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市分公司

开 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70 000字

版 次: 1999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: 1-1 0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311-3817-4/G·3479

定 价: 16.00元

中国的文艺理论及其术语,是从中国自己的语言艺术实践中升华出来的。我们完全应当理直气壮地使用自己的术语,以此揭示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审美情趣。

季羨林:《东方文化复兴与中国文艺理论》

我是只为写作才存在的,如果我说“我”,那就意味着“写作的我”。

[法]保罗·萨特:《萨特自述》

序 言

王志彬

万奇同志的专著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，即将出版，我很高兴。此前，万奇同志就曾对我说，这本书出版的时候，要由我来写一篇序文，我以为这是份内之事，义不容辞的；现在，我读着书稿的校样，时有年华似水，“长江后浪推前浪”的感慨，往事历历，恍然如昨。

万奇同志 16 岁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，淳朴的圆脸上还带着自然的童稚气。他勤奋聪敏、多思好问、且诚挚率真，执著于自己的爱好，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。留校工作后，经过在助教进修班的专业学习和初步的教学与科研实践，他的潜力和优长渐渐发挥出来，各项工作都很出色，屡获褒奖；为文治学也年有进境，既博闻强记，又求真务实，先后参加了《中国写作理论辑评》和《中国写作理论史》的编写工作，积累了较多的学术资料。同时写出了一批有思辨力度和实践意义的论文，如《技法与技巧》、《散文的形与神》等，都表现了他敏锐、独到的见解。后来，他到南京大学进修，师从裴显生教授得以深造，开阔了学术视野，掌握了学术动向，磨炼了治学方法，因而层楼更上，有了新的进步。一方面，他关心、

思考文章写作理论研究中的新情况、新问题,力图正本矫弊,补缺使完,写出了《论写作学之本体》、《写作基本规律再认识》等既富学术品位,又具现实意义的优秀论文,先后受到内蒙古自治区与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奖励;另一方面,他着手准备进行专门、系统的文章写作理论研究,攻读了大量古今中外的经典性论著,并参与了《基础写作学要义》的策划、编写工作,主编完成了《写作技法实用指要》一书,稍后又写出了长篇论文《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概览》,受到学界的好评。相继于此前后,他被破格擢升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最年轻的副教授;并被选举为内蒙古自治区写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;聘任为中国写作学会及其现代写作学委员会的副秘书长。

由此我感到,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一书的诞生不是偶然的。万奇同志的阅历、学养,为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的著作、出版,奠定了扎实的基础。万奇同志的成就,虽得助于某些客观因素,但归根结蒂是“内因”起了决定的作用。

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最突出的特点,是它以桐城派文论为中心,上溯下延,对历代文章理论作了分门别类地综合梳理。它归纳其同,界划其异,理枝循干,整派依源,比较清晰地阐明了中国文章理论发展的脉络及其通变关系,形成了一个古今贯通的完整系统。作者在《文用论》中指出:“文用论”的原型,诞生于先秦时期。它由叔孙豹的“不朽说”、荀子的“明道说”和墨子的“尚用说”三个部分组成。“后代‘文用论’尽管说法不同,却都是由此‘生长’出来的。‘不朽说’引出了六朝的‘扬名后世’;‘明道说’衍化出唐宋的‘明道—载道—是道’;‘尚用说’,嬗变为清代的‘经世致用’。”“可以说,先秦之后的各代‘文用论’在深层意义上都是其‘原型’的复活。”这样

“原始以表末”的概括和论述，贯注于全书各个部分，虽因力求择其要而难免略有所疏，但它开拓了中国文章理论研究的途径和范围，梳理了中国文章理论的来龙去脉，对于全面地理解、批判地继承传统文章理论，借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章理论之本体，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贡献。

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的另一重要特点是：它古今相参，密切联系实际，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鲜明的针对性。它既以写作实践作为检验历代文章理论的标准，又以经过验证、信而不爽的传统文章理论来解析写作实践中存在的问题，指导写作实践，实事求是地辨正然否，针砭文坛时弊。作者在《文律论》中阐发刘勰“执术驭篇”之说时，明确指出：“以今天的眼光看，刘氏的‘执术驭篇’也有借鉴意义。时下文坛也是‘弃术任心’，‘各竞新丽’；或曰‘后现代’，或曰‘新体验’，或曰‘新状态’。然‘声悴’、‘理拙’，偶有‘义华’、‘文泽’，也因‘借巧僥来’，而‘后援难继’，只是‘玩名词’、‘玩文学’而已。因之，执术驭篇，刻不容缓。”这种以古鉴今的批评，亦屡见诸于全书各部分，如对桐城派的总体评价；对“文气论”、“文法论”的辨析；对“文要论”、“文戒论”、“境界论”的探究，都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。尽管对它可能会有某些歧见，但它也会促进人们的思考，辨明是非，献可替否，与某些不疼不痒的“为文而文”之作，是迥然有别的。

《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》还有一个突出特点，就是讲究章法，注重框架。它精当地选义按部，擘肌分理，既将桐城派与中国文章理论的方方面面，组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，又将其条分缕析地解剖为若干方面，分之则独立成篇，合之则浑然一体。全书包括绪论、结论、本论三大部分，绪论阐述桐城派的

产生和嬗变,结论辨析桐城派的理论贡献和总体评价。而本论则作为全书之主体,将桐城派文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作者论、创制论、文本论、品用论和源流论五个方面;每一方面中,又分别包括若干分论;分论则纲目条款相包相容,层次分明,各自独具其特定的中国文章理论的内涵和概念。有些地方还附以图表,分别标示有关内容之间的并列、主从、分总、先后之关系,简而有法,要言不繁,表现出作者执术驭篇、精虑造文的功力,为学术著作的撰制,提供了一个可资化用的范例。

古人有云,“学无止境”。仅以文章而言,我国作为古老的文章大国即有着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珍贵遗产,有待于“钩深取极”,研究借鉴。新时期以来,我国的文章理论与写作理论并驾齐驱,有了长足的发展,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,许多先行的学者为此做出了令人钦敬的卓越贡献。惟“岁月飘忽,性灵不居”,自然规律不可抗拒。在学术领域中,也是“江山代有才人出,各领风骚数百年”的。由万奇同志我想到了许多与他同时代的青年学者,他们正在茁壮成长,奋发竞进,取得了可喜的成果。他们必将踏着先行学者铺垫的学术台阶,再攀新高,创造出中国文章理论的新辉煌。

余心有寄,是以为序。

1999年4月18日
于内蒙古师大一楼

目 录

序 言	王志彬	1
-----	-----	---

绪 论

☐ 桐城派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基础	1
☐ 桐城派的嬗变	8

本 论

☐ 作者论	
性情论:文章必根乎性情	19
修养论:义理、考证、文章,三者兼善	31
☐ 创制论	
文法论:言之有序,法而无法	44
文机论:兴会之到,机应于心	59
文气论:全在气字上用功夫	69
文戒论:文家须知操觚之忌	87

□ 文本论	
文类论:学文必先辨门类	103
文要论:为文应知八字诀	115
境界论:虚实相合,境外有境	141
□ 品用论	
文用论:扬名载道,经世致用	155
文评论:品鉴古今鸿篇巨制	166
□ 源流论	
文源论:文学起源,其在斯乎	178
文迁论:文章变迁,各有由然	191
结 论	
□ 桐城派的理论贡献和对它的总体评价	200
附 录	
桐城派自认所承之古文家系统表	207
桐城派及阳湖诸子之关系表	207
桐城派文人系统表	208
桐城派文人传表	209
桐城派文人传表(续)	226
参考书目	229
后 记	232

绪

论

桐城派,是方苞始创、刘大櫟“继之益振”、姚鼐确立的清代文章流派。它延续 200 余年,与清朝“国运”相始终,造就了知名文士 600 余人。其时间之长、影响之大,在中国文章史上,乃至世界文章史上,都是罕见的。它“学行继程朱之后,文章在韩欧之间”,有明确的“道统”、“文统”,所以自成一派;又因方、刘、姚皆为安徽桐城人,故曰“桐城派”。

桐城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及其历史基础

一、时代背景

一种文章现象的产生,总是与它所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。正因为如此,才有刘勰“文变染乎世情,兴废系乎时序”的感

叹。虽然由此而走向极端的“时代决定论”是不可取的，但考察文章现象，从时代入手，还是必要的。

清朝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。它集历代统治经验之大成，统治中国达 268 年之久。它和历代王朝一样，建立之初，中央集权得到了进一步加强。由于它是非汉族政权，故这种集权较之历代更甚。而中央集权的实质是皇权，因此，说到底，中央集权的加强是皇权的加强。清代皇帝的言论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明：

今天下大小事务，皆朕一人亲理，无可旁贷，若将要务分任于人，则断不可行。所以无论巨细，朕心躬自断制。^①

无知小人，辄议朕为烦苛琐细，有云：人君不当察庶务者。……此皆朋党之锢习未去，畏人君之英察而欲蒙蔽耳目，以自便其好恶之私。^②

本朝家法，自皇祖皇考以来，一切用人听言大权，从无旁落……^③

朕亲阅本章，折中酌定，特降谕旨，皆非大臣所能参予。^④

显然，“大小事务，皆朕一人亲理”，“用人听言大权，从无旁落”，高度集权达到了顶点。

政治的集权，反映在思想文化上也必然是“大一统”。为

① 康熙语，见《东华录》康熙朝卷 91。

② 雍正语，见《朋党论》。

③ 乾隆语，见《东华录》乾隆朝卷 28。

④ 乾隆语，见《东华录》乾隆朝卷 80。

了维护皇权，清朝大兴“文字狱”，以剪除“异端分子”。对桐城派影响较大的戴名世，就是清朝“硬”的一手的牺牲品。戴名世（1653—1713），字田有，一字褐夫，号药身，又号忧庵。20岁开始“课徒养亲”，28岁入县学为诸生，后4年为拔贡，补正蓝旗教习，授知县未就。34岁由贡生入就国子监。此后历时17年，到处流浪，后归桐城南山故里，旋又客游姑苏。约在43岁时，迁居金陵，结识了方苞。53岁中举。4年后中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。49岁时弟子尤云鹗等将他平时所写的文章刊刻为《南山集》。59岁时，御史赵申乔奏劾他“私刻文集”、“狂妄不谨”、“语多狂悖”，结果被下狱腰斩。

为了笼络人心，清朝又倡导尊孔读经，鼓吹程朱理学。康熙曾大修孔庙，祭孔时行三跪九叩之礼，并封孔子为“大成至圣文宣先王”（至圣先师）。他特别推崇程朱理学：

宋儒朱子，注释群经，阐发道理，凡著作及编纂之书，皆明白精确……今经五百余年，学者无敢疵义，朕以为孔孟之后……朱子之功，最为宏矩。^①

在《御纂朱子全书》序言中又说，朱子“文章言谈中，全是天地之正气，宇宙之大道”。可谓吹捧至极。其目的无非是用孔孟之道、程朱理学驾驭人心，维护其统治。论及文章写作，康熙则明确指出：“文章以发挥义理、关系世道为贵，骚人词客，不过技艺之末，非朕所贵。”“务使阐发义理，裨益政治。”^②雍正也说：“文之载道，与政治相通。”^③ 乾隆与康、雍二人的看法

①《东华录》，康熙朝五十一年二月。

②康熙十二年癸丑辛酉上谕，十六年十二月庚辰上谕。

③雍正十三年辛巳上谕。

相同：“朕所好者载道之文。”^①可见，他们都要求文章载孔孟、程朱之“道”。他们还反对“排偶文辞”，认为文章语言应该“明晰”、“清真雅正”。而桐城派以程朱理学为“道统”，以韩欧文章为“文统”，文字尚“雅洁”，与清朝统治者的观点“暗合”，故能应运而生。

桐城派的道统、文统是其始祖方苞确立的。他尊奉程朱，原因有三：（一）早年无锡的刘言洁就曾劝他“尽弃时文”之学，以治古文，又劝他“讲索宋儒之书”^②，这对他影响很大，到后来他把“学行继程朱之后”作为立身祈向。（二）他崇尚“不为一身之谋，而有天下之虑”^③的仁人志士，并表示：“为国家担当世教，为天地保护生民。”^④在他看来，“讲世务，以备天下国家之用”^⑤是“程朱之学”的主要内容，故以程朱为宗。这是主要原因。（三）《南山集》案起，他被判死刑，后经人说情，免诛；且为皇帝召入南书房。皇帝尚理学，客观上也要求他以程朱为宗，“适者生存”。以上所言，决定了桐城派的道统是程朱理学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康熙把方苞作为“施恩”对象，原因也有三：（一）方苞是名士，影响大，“施恩”于他，能起到笼络人心的作用。方苞考取秀才后，学使高某挟之至北京，进了国子监，声气广通，名誉鹊起，他的时文，被称为“江东第一”；他的古

① 乾隆十三年三月庚辰上谕。

② 《方苞集·再与刘拙修书》。

③ 《尹氏夫人李氏墓志铭》。

④ 《与陈古成书》。

⑤ 《李刚主墓志》。

文,更受推崇:“韩欧复出,北宋后无此作。”^① 康熙也认识到这一点:“方苞学问,天下莫不闻。”^② 因此对他格外开恩。(二)方苞是因给《南山集》作序而牵连入狱的,是从犯,这是“施恩”的客观条件。(三)方苞以程朱理学为立身祈向,与康熙所尚相同。方苞因祸得福,桐城派也就有了产生的现实基础。

由此可见,清朝的文化统治政策是软硬兼施。桐城派是清朝提倡理学、笼络人心“软”政策的产物。

二、历史基础

清朝,是古代写作的终结时代,也是它的辉煌时代。诗文书,量大质高,自不必说;单就戏曲、小说的成就而论,足以令人惊叹:孔尚任的《桃花扇》与洪昇的《长生殿》是戏曲写作中的“双璧”;蒲松龄的《聊斋志异》是古代短篇小说的“高峰”;吴敬梓的《儒林外史》是讽刺艺术的“典范”;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则是长篇小说的“楷式”。至于写作理论的成就,则更令人瞩目:叶燮的《原诗》是传统诗学的集成;况周颐的《蕙风词话》是古代词学的集粹;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是戏剧理论的精华;而桐城派的文章理论则是“漱”历代文论之“芳润”……

从文章史角度看,桐城派是中国文章发展的必然产物。

中国文章历史悠久。先秦诸“子”,汉代《史记》,唐宋古文,明清小品,各领风骚:或记言叙事,或写景状物,或明理陈情,色彩纷呈,蔚为大观。

在文章发展的过程中,曾有三“次”“复古运动”:

① 《方苞集·再与刘拙修书》。

② 《两朝圣恩恭纪》。

第一次是唐代“古文运动”。倡导者是韩愈、柳宗元。他们反对六朝以来“多欲练辞”、“繁采寡情”的浮华文风,提倡学习东汉以前朴实的文章,并亲自实践。韩柳之后,文章写作讲究内容翔实、章法灵活、句式多样,“始别有一番文境”。“古文运动”名为“复古”,实乃革新。它对后世文章写作实践和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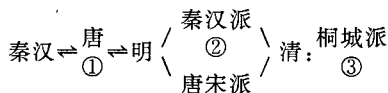
第二次是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。“前七子”即李梦阳、何景明、徐贞卿、边贡、王廷相、康海、王九思七才子。他们不满歌功颂德、平易雍容的“台阁体”,试图以“文必秦汉”来纠其弊,强调“文必有法式”。“后七子”即李攀龙、王世贞、谢榛、宗臣、梁有誉、徐中行、吴国伦,他们承继前七子的主张,倡导拟古人“格调”和“法式”。然而,前后七子的局限在于“句拟字摹,食古不化”。以唐顺之、茅坤、归有光为代表的“唐宋派”,公然反对拟古风气,主张学习唐宋文章的“法度”,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。

第三次是清代桐城派古文运动。他们承明代反对拟古的“唐宋派”而来,主张师法唐宋八大家的文章,同时也提出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。方苞就特别推崇《左传》和《史记》,指出,“记事之文”,惟此二者“各有义法”^①。他还盛赞《报任安书》:“如山之出云,如水之赴壑,千态万状,变化于自然,由其气之盛也。”^②其原因如郭绍虞先生所指出的那样:“桐城文论之所自出,固然是明代为唐宋古文者归震川诸人的关系,实在也

① [清]方苞:《书五代史安重海传后》。

② 转引自姚永朴的《文学研究法·告语》。

受明代为秦汉古文者前后七子的影响。”^①此见中肯。文章史上宗唐宋、宗秦汉两种观点的对立在桐城派古文运动中“消解”了。桐城派既以唐宋为宗，又以秦汉为师，兼容并蓄，确乎是中国古代文章发展之必然（见下图）。



由此观之，以秦汉为宗，始于唐代古文运动，尔后“一分为二”：一派是明代前后七子，继续效法秦汉；一派是“唐宋派”，反对师法秦汉，以唐宋为宗。其实，两派没有根本的不同，他们都是承唐宋而来，以古为宗；如果说两派有区别的话，“秦汉派”师法的是唐宋古文家的理论主张，“唐宋派”效法的是唐宋古文家的文章写作实践。这样看来，两派主张在桐城派古文运动中“合流”是“水到渠成”的。

综言之，桐城派的产生，既有其不可忽视的时代原因，也有值得我们关注的文章自身发展的原因。准确地说，它是两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有些学者片面强调时代原因，大谈“桐城派与清朝统治相适应”、“桐城派的产生是出自清王朝的政治需要”，忽视了它产生的内部原因（很少论及，甚至不谈），是不符合实际的。任何现象的产生，总是诸种因素“合力”作用的结果。偏执一面，不顾其余，是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结论的。

^① 郭绍虞：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79年版，第623页。